

柳宗元评传

孙昌武 著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元评传/孙昌武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991 - 9

I. 柳… II. 孙… III. 柳宗元(773 ~ 819)—评传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527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柳宗元评传

孙昌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 rulin. com. 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27.5 字数 307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991 - 9

定价: 54.00 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 亚 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我们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



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



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



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厘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前言

历史上的所谓“中唐”(本来,把唐代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是文学史、主要是诗歌史的分期方法。“中唐”一般是指自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文宗大和九年〈835〉这七十年间)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唐王朝已度过了它的极盛阶段。“安史之乱”(755—763)近十年的大动乱,从根本上损伤了国家的元气。叛乱虽被平定,但唐王朝却是国是日非,矛盾丛生,此后就基本处在不间断的战乱、动荡之中。虽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声威,进行着艰苦努力和拼命挣扎,甚至也曾出现过如元和(806—820)年间那样短暂的“中兴”局面,但终于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危局,再现昔日的辉煌了。但正是在这急剧走下坡路的中衰时代,在“中唐”的后期,却出现了唐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不是“盛唐”时期思想、文化大繁荣的“回光返照”,也不是前者的重复。它具有独自的内容和特点,取得

了特殊的成就,而就其历史重要性来说,在许多方面是超越了前面的那个光辉的时代的。在创造这新的辉煌的人物中,柳宗元是杰出的一位。

柳宗元(773—819)是唐代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品格兼备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十分杰出的;而在哪个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要,又是难以轩轻的。而且如本书将要介绍的,柳宗元在任何一方面的具体成就,都和他的整个人格、全部修养相关。现在我们写作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的传记,暂且把“进步思想家”的头衔放在前面。而除了思想、文学、政治这三个领域之外,他还有着其他多方面的才能,在文化史上作出了诸多贡献。例如在书法方面,他长于章草,在唐时即被与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并列,真迹为时所宝^①;他对《本草》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并进行过长期的种植药草的实践。如此等等,他可说是代表着一代文化水平的伟人。

韩愈(768—824)与柳宗元生活在同一时期,又是终其一生的挚友、诤友。他在给这位命运坎坷、半生沦落的友人(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和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妨碍其友好关系)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

① 赵璘:《因话录》卷三。



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①

这段话作为柳宗元一生的盖棺定论,透露出韩愈本人的政治偏见,这以后有机会讨论。但这里表现的对友人的真挚同情和高度赞誉是相当感人的。此外其中的一个看法更值得重视,就是他认为正由于柳宗元政治上的坎坷不遇,使他有可能在“文学辞章”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这里所谓“文学辞章”,不单是指文学创作,而且指一般的文章著述,即总括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全部作品。韩愈对于“为将相”还是取得“文学辞章”成就的“孰得孰失”故作疑辞,文词的背后显然是在肯定后者。韩愈本人是“文章之士”,他对“文学辞章”的意义是有着深刻了解的,因而这个看法也特别地中肯。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和韩愈一起倡导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典散文发展面貌的“古文运动”,在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时代又正是唐诗“百花齐放”的第二个高峰,他以其高简明净的诗风独辟蹊径,成为影响深远的“韦(应物)、柳”一派诗歌创作的代表;他作为辞赋发展史上的后劲,被评价为唐代“独得骚学”的第一人;他在传奇小说的创作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作品传世。他曾经说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这大体上即是指今天所划分的散文与诗歌两大类创作;他又说,在这两个领域,“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

^① 《韩昌黎集》卷三二《柳子厚墓志铭》。



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①,就是说,他认为在散文和诗歌两个领域同样取得重大成就是不容易的。而柳宗元本人则正是在诗、文、辞赋、小说各种体裁的创作上都取得巨大成绩、造成巨大影响的作家。他在文学理论上也有重要的建树。特别是他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革新的意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理论依据,而且带动了一时潮流,并造成了长远、深刻的影响。在群星璀璨的唐代文坛上,他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成就当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像他那样在文学诸多方面都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鲜见其例的。

柳宗元是个失败的政治家。他的从政经历很简单,在短促的仕途得意之后,是壮年失志,半生沦落。他作为当时典型的人文官僚,进士出身,经府、县僚佐为朝官,在朝也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803—805),最高晋升到从六品的礼部员外郎;然后即由于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南荒,一斥终老。在唐代叙官制度中,朝官五品和六品之间是个关键的界线,进入皇帝亲命的五品职位以上才算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可柳宗元终生也没能达到这样的地位。他在唐代政治史上造成影响,主要是因为他是“永贞革新”的领导者之一。这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暴起领事”,依据当时反对派的攻击和传统的偏见,被看做是“小人”得志。当然,在唐代历史上,这一斗争虽只是一小批朝廷中新进官僚革新朝政的失败的尝试,其短促的掌权施政中又有许多失误和疏漏之处,却是代表了当时政治现实中努力改革的大方向的,因而在德宗朝末期至短短的顺

① 《柳河东集》卷二—《杨评事文集后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世绿堂本断句排印本,1960年版;以下引用柳文均据此本,并用其它版本参校,一般仅注卷次,必要时加注说明。



宗朝的沉闷的政治局面下,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对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远远大于其实际成果的作用。柳宗元在这次流产的革新活动中,不只做了许多实际领导工作,更以革新派的思想 and 理论代表者的身份进行理论斗争和舆论宣传;这样,他就不仅在革新中作出了重大的实际贡献,他从事斗争时的思想理论、他在斗争中表现的为人品格更成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影响到后来。以他那样低微的地位和短促的从政生涯,却造成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同样是罕见其例的。

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的贡献更是多方面的。他在众多的理论领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其思想开阔而活跃,理论细密而精邃,代表着一代思想理论的高峰。在哲学世界观方面,他是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天命”观,为自先秦以来长期作为思想理论斗争焦点的“天、人之际”问题作了新的总结,从而为宋、明理学“性理”学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他的进步的历史发展观不仅具有积极的现实政治意义,更富于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内容,其中的许多观点是大大超越了时代的一般认识的;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首先是着眼于现实的,但同样富有充实的理论内涵;他的学术造诣是多方面的,在经学、诸子学、史学等广泛领域都独具特识,虽然在有些方面并没有得以充分发挥,但其观念的新颖,方法的矜创,都给后人以巨大的启发;他的文学理论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的成功的文学实践活动的总结,不仅对当时的文坛起了实际指导作用,更是留在文学史上的珍贵遗产,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他信仰佛教,精通佛说,这在后代是常常为人所诟病的,他思想中的这一方面对他自身的消极作用和对后代的不良影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但如从思想史发展的潮流看,他兼容佛教的态度却又代表了



儒、佛、道三教交流和融合的大势,而宋代理学的创立正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的果实;而且还应注意到,他是唐代文人中少数对于佛教教理进行过认真研究并能够深入理解的人之一,他颇能汲取佛教思想中的有价值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他对佛教的态度是不可简单地给予否定的。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特别引起后人惊异和艳羡的,是不管国家形势兴衰变化如何,那持续三百年间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发展的浪潮,其辉煌灿烂的成果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鲜有其他时代可以比拟的。然而如果具体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个时代高度发展的文化中,最为发达的是文学、艺术和宗教。当时的时代环境似乎特别适于培养和发展人的感情、激情、理想、幻想等方面。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再有魏晋时期那种倾心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兴趣,也较少宋、明以后那种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入探讨和理性思索的执著。兴盛的时代激发起人们充沛的感情和高远的理想,主要通过形象的、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相比较之下,这个时期人们对于理论方面的兴趣似乎淡薄得多,因而这一方面的成就也显得暗淡得多。这可以说是培育和产生艺术形象和宗教玄想的时代。而柳宗元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却是唐代为数不多的在思想理论建设上作出成功努力并取得突出贡献的人物之一。在这历史发展的巨大转折时期,在中国封建制度自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这一关键时期,他担负起在思想理论领域反映这社会巨大转折的任务。如果说在唐代的文学星空里,柳宗元只是璀璨群星中的一颗明星,还有像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等一批人与之齐肩并立;那么在思想理论领域,在同时代,柳宗元可说是鲜有其比的杰出人物。从这一点可以了解柳宗元在一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也因此他的思想理论成就是



特别值得珍视的。

对于了解柳宗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他所处的中唐时代又是唐王朝极盛后的中衰阶段。在唐德宗到唐宪宗在位(780—820)的这四十年间,是“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统一的封建国家得到恢复、得以重建的时期,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为自己的命运与前途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造成了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当时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都对这一局面积极做出反应,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局面。一方面总结过去,一方面探索未来。当时出现的显著的社会现象,除了多种政治主张的激烈搏斗之外,重要的还有儒学“复古”运动和文学上的诗文革新运动,它们进而又带动了其他一些思想领域的发展与繁荣;宗教中则有佛教里的禅宗和净土宗的兴盛、道教中内丹一派的兴起以及“三教调和”观念的突出发展,宗教思想的这种演变乃是世俗思想形势的曲折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活跃的思想、学术局面下,孕育了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的萌芽,预示着未来理学的形成。所以中唐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学术、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柳宗元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从事理论活动,作为这一社会转折时期的思想界的代表和先驱,其贡献也就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柳宗元在思想上的贡献与意义在历史上一般是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被否定了的。当然不是说在古代没有人对柳宗元的思想给以肯定;特别是他的某些具体观点,是历来就有人加以称许的。但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一般说来确是被低估了。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其作为思想家的成就被巨大文名掩盖了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他的许多观点背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或是由于其他原因而难于被后人所理解。五代刘昫的《唐书》作为官修史书的盖棺定论,称扬柳宗元的文才,却说他

